

一场友谊赛改变国球史



毛泽东接见容国团

一场看似平常的友谊赛，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容国团人生的走向，也改变了中国乒乓球项目的历史。

友谊赛令人关注

1956年9月7日晚，北京体育馆座无虚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都坐在主席台，观看着港澳联队和中国乒乓球队间的比赛。

19岁的容国团作为港澳联队的队长出席，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球员。从1954年起，他就蝉联香港公开赛的冠军。

“皮包骨的瘦高个，打球能有力吗？”第一次见到容国团，庄则栋忍不住大呼。

大家眼前的容国团确实没什么冠军相。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又长期受肺病折磨，容国团一直面黄肌瘦，瘦骨嶙峋。然而，这个“瘦高个”用球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当晚的比赛中，他将中国乒乓球队的三位核心人物——王传耀、傅其芳和胡炳权纷纷“斩落马下”。这让中国队队员也不禁咋舌。

其实，对这次友谊赛，容国团的心中另有深意。

容国团离开香港

生长在香港的容国团，此时正处于报国无门的窘境中。1954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埠标赛开战。17岁的容国团代表年轻的“公民队”参赛。赛前，他被乒总会邀到了茶楼谈话，要他打假球，以促成南华队蝉联冠军，并允诺送一笔钱作为补偿，容国团当即拒绝。随后的比赛，容国团夺取了男单、男双、男团3块金牌。他在香港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了乒总会嫉恨的对象，用尽一切手段排挤他。195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乒总会在容国团的名字上做手脚，使他失去参赛机会。

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一直对祖国心怀向往。再者，当时容国团已染上了肺病。父子俩商量后认为，只有在国内的环境下才能一边治病，一边练球。于是，到北京前几个月，容国团就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请求报效祖国。当时，广东省体委考虑到内地和香港不同的社会体制，

一直未作回应。

随后，容国团借国家队邀请港澳联队回访比赛的机会，展现了自身的实力，给自己回祖国增加了砝码。

坐在看台上的贺龙，当即写了一封邀请信，转给广东省体委。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接到广州体育学院入学通知书。

国球曾处于边缘地位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体育掀起了一波打破世界纪录的高潮。

最先“冒头”的是举重、田径和游泳。举重的陈镜开、赵庆奎、黄强辉，游泳的戚烈云、穆祥雄，女子跳高的郑凤荣接连在一系列国内比赛或与苏联队的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相比之下，乒乓球还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在中国体育的棋盘上，处于极边缘的地位。

中国乒乓球命运改变

由于是副总理亲自点将，从容国团回国第一天起，就享受到了“特殊关照”。

1959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赶赴多特蒙德，容国团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正值建国10周年，这块金牌来得恰逢其时，民众热情空前高涨，中国乒乓球队也成为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的第一支队伍。周恩来将容国团的冠军和10年国庆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周恩来大笔一挥，将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每逢外宾来访，容国团更是参加国宴的常客。

容国团夺冠的第二天，国际乒联便决定将下一届世乒赛的举办地放在中国。此后，中国乒乓球运动长盛不衰。

（摘自《周末》）

郁金香引发的经济危机

1593年，一位荷兰商人格纳从土耳其进口首株郁金香，由于这种花是进口货，因此拥有郁金香花便成为有钱人的符号。开始只有郁金香的行家才懂得欣赏郁金香之美，但在形成风潮后，投机客便趁机炒作，只要今天买了，明天就可赚一笔。买的人多了，交易市场也就形成了，交易场所也逐渐热闹起来。

1634年，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到中产阶级，更蔓延为全民运动，大家都来买卖郁金香了，炒家只看到买低卖高，利润就进来，于是全民都变成郁金香的炒家。1000美元一朵郁金香花根，不到一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两万美元了。到了1636年，郁金香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股市上市。这时，一朵郁金香花根售价相当于今天的76000美元，比一部汽车还贵。这是有名的郁金香花根泡沫。

此时，荷兰政府开始采取刹车的行动，而由土耳其运来的郁金香也大量抵达，郁金香不再那么稀缺，于一瞬间郁金香的价格往下滑，6个星期内竟然下跌了90%，于是哀鸿遍野，不管政府怎么护盘都挽救不了，郁金香的价格持续探底。荷兰政府宣布这一事件为赌博事件，结束这一场疯狂的郁金香泡沫事件。

从此之后10年间，荷兰的经济创伤才慢慢复原，在最高点值76000美元的郁金香，6个星期之后竟只值一元，这就是有记录的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泡沫事件。

（摘自《周末》）

军统设计“四八”空难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后，与叶挺、邓发一起乘飞机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4月19日，延安3万多名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四八”空难

1998年4月18日的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在“四八空难”发生后，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事后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从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而且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种迹象表明，必定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党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只好说飞机是“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特务做了手脚

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谈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

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



“四八”烈士送别仪式。

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飞机失事

4月8日，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是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往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严重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挥了作用。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而且，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据《旧事》）

中泰关系中的“人质外交”事件

1956年8月19日，泰国政府最高顾问乃汕在其总理室披汶的支持下，通过绝密的渠道，将自己的儿女送到中国学习。此乃被周恩来总理戏称为中泰关系中的“人质外交”事件。

二战结束后，泰国严重依赖美国，沦为美国反共反华棋盘上的一个小走卒。然而，仰“美”鼻息的日子并不好过。泰国政府意识到一味盲从美国反共反华并非正道。恰好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泰国外长万亲王同中国总理周恩来有了接触，并接受周赠予的中国丝绸等珍品。

万亲王十分赞赏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周总理本人也深怀好感。回国后，他和銮披汶总理密商，决定由乃汕挑起秘密同中国建立联系的重担。首次尝试是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来建立同中国的联系。不料好事多磨，美国侦察后，大为震怒，断然严加阻止。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乃汕翻阅了中国的古书，发现中国人较重视“和亲”，便献策：不妨采用送“儿童人质”去中国的办法，以取信于中国。他把12岁的次子常怀和8岁的女儿常媛送到中国，作为掩饰和平衡，他又将其长子常曼送往美国学习，此举可谓用心良苦。这对小兄妹在中国受到周恩来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周恩来还批准装修了他们的新居。在那里，管理员、司机、警卫都会讲泰国语。周恩来日理万机，又常要出国访问，后来就把小兄妹托付给老资格的外交家廖承志照顾。1958年9月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小兄妹在中国第三学年的开始，廖承志表情沉重地来到俩孩子身边告知：泰国发生军事政变，銮披汶政府被推翻。廖承志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被捕了。

震惊中的小兄妹心如乱麻，但哽咽中清楚地听到“廖爸爸”的话语：“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保护你们，让你们在中国安定生活、学习、成长！”

当初，乃汕献策送儿女到北京“和亲”时，原估计中泰两国将于一至两年内建交，届时小兄妹即可返泰。孰料天不从人愿。乃汕被囚七年，出狱后曾来中国探望儿女。常怀在中国生活10年，后回泰国当上了议员。常媛在中国生活13年，后嫁给外籍人，她所生的俩儿子分别起名为“念周”和“念廖”，以志感恩和怀念。

（摘自《老年生活报》）

周恩来巧劝张自忠

爱国将领张自忠虽治军有方，但因他长期吸毒成瘾，使全军上行下效，严重影响战斗力。

1939年，李宗仁曾劝其戒毒。张也当着李宗仁及团以上军官的面销毁烟具，焚烧烟土，但后来还是难敌鸦片诱惑。爱国民主人士胡秋原先生与张自忠私交甚厚，他本想前去劝张再次戒毒，但认为他连李宗仁的话都听不进去，自己劝未必奏效。这时，他想起了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胡秋原的来意后，托胡秋原转赠一件礼物给张自忠。

张自忠当着胡秋原的面将礼物打开一看，原是一张中国地图，图上标有侵华日军的蚕食情况。张目睹此物，激动地说：“张某身为党国军人还吞云吐雾，致使军营风气日下，我还算个军人吗。”讲到这里，他神色凝重地仰望窗外的蓝天，宣誓道：“苍天在上，胡先生作证，我张自忠自即日起发誓戒毒……”张自忠从此就再也没吸过毒。

周恩来“金口”未开，巧劝张自忠戒毒一事一时传为佳话，连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亦喟然长叹道：“一言未发胜李公，此时无声胜有声……”

（摘自《老年生活报》）